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 低生育意愿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王 军 王广州

摘 要:低生育目前正呈全球蔓延趋势,人口转变论等旧有理论已经无法对低生育现象做出合理解释,理论创新需要更为关注微观层面育龄夫妇自身生育意愿。中国当前极低生育率形势客观要求生育意愿研究重点转向生育意愿的有效测量、低生育意愿成因以及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公共政策制定这三个方面。首先,生育意愿可以拓展为包括生育动机、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的序列性指标体系,并且测量技术呈现量表化趋势。其次,“低生育陷阱假说”、计划行为理论和 TDIB 模型是目前对于低生育意愿形塑机制的三种主要理论解释。最后,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公共政策应致力于减少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之间的差距,并将个人全生命周期、社会全人群、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这三个视角融入政策全过程。

关键词:三孩政策; 低生育水平; 低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 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多元城镇化路径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1BRK041)

作者简介:王军,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01);王广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28)

DOI:10.13613/j.cnki.qhdz.003141

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中国2020年出生人口规模仅为1 200万人,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水平。5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作为重大战略性举措,三孩政策是“全面两孩政策基础上的继续优化”,试图通过“提振生育水平减缓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所造成的冲击”。^①

三孩政策实施的同时,生育支持配套政策也加速落实。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颁布实施,提出为了平缓总和生育率下降趋势,要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和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真正做到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几乎同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政策。全国各省市也积极行动起来,除了制定符合各地区实际的“双减”政策方案之外,许多省市还准备实施延长三孩孕产假尤其是父亲带薪陪产假、发放生育津贴等鼓励三孩生育的措施。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要通过三孩政策和生育支持配套政策更好提升当前过低生育水平,关键之处在于需要更好了解和把握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即对民众的低生育意愿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其实,从中国2016年初开始实行“全面两孩”政策开始,政策生育空间的扩展已经使得限制性人口政策不再成为制约育龄夫妇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生育政策的调整尚未引起显著的生育数量增加”,而生育自主性的增强使得生育越来越成为育龄夫妇个人和家庭的事情,即育龄夫妇自身生育意

① 王军、张露:《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形势、长期发展战略与治理策略》,《治理研究》2021年第4期;王军、李向梅:《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人口政策困境与出路》,《青年探索》2021年第4期。

愿成为微观层面生育行为和宏观层面生育水平的主导性驱动力量。^① 三孩政策将政策生育空间又进一步拓宽为三个孩子,这使得人口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制约作用更为微弱,而育龄夫妇自身生育意愿的作用更为凸显和更加具有决定性。

鉴于育龄夫妇自身生育意愿已经成为中国当前和未来生育水平的决定性力量,学术界亟需对三孩政策下民众的低生育意愿,尤其是生育意愿的测量方法、低生育意愿的成因和形塑机制以及针对性公共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切实了解和把握民众低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其形塑机制,才能真正找到导致当前过低生育水平的根本原因所在,从而做到科学预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在客观估计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未来趋势的基础上,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也才能更为精准有效。

一、低生育的全球化及理论解释

人口发展具有普遍规律性,低生育现象也同样如此。要想更好地了解 and 把握中国的低生育现象,首先要做的就是开阔研究视野,从全球人口发展和变迁中来加以重新定位和审视。

(一) 低生育的全球化趋势

自从 1798 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发表以来,世界人口发展的实际历程可谓跌宕起伏,尤其低生育的全球化趋势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逃离不了所谓“人口陷阱”,即经济越发展,生养的人口会越多,并且人口增殖速度要远超过经济发展(物质资料积累)速度,这会导致贫困、饥饿甚至战争、瘟疫,从而使得人口出现大幅减少,经济发展也重新起步,由此开始人口与经济循环的新一轮循环。

虽然马尔萨斯对世界人口未来发展的态度并不乐观,但欧美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实际人口发展历程却基本否定了马尔萨斯人口观。工业革命期间的巨大科技进步、医疗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等因素共同形成了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快速增长并存的局面。并且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开始出现一种与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恰恰相反的担忧,即担心生育率过低(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导致的人口负增长会削弱本国的综合国力、国民财富以及军事力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欧美许多国家对低生育的担忧趋势更加明显,一些国家更是实行了力度空前的鼓励生育政策。

二战以后,欧美国家出现了一轮补偿性生育,即著名的“婴儿潮”,这使得其对自身低生育的担忧暂时缓解,而世界人口发展的关注重心也逐渐转向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问题。发展中国家受益于战后经济重建、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的引进和普及等因素,人口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实现了大幅下降,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而人口出生率则一段时期内居高不下,从而导致了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这种对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担忧达到了顶峰。当时主流观点认为,欧美国家应通过提供避孕知识、节育器械、技术和药物等手段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人口过快增长趋势,从而避免马尔萨斯预言的实现。

不过,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人口形势又发生了急剧改变。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开始出现了显著下降,人口增长趋势不断放缓,到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生育率更是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出现了与欧美国家逐渐趋同的趋势;另一

^① 郑真真:《低生育率下的生育行为及影响因素》,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编:《中国人口年鉴 201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Z. Z. Zheng, Reproductive Behaviour and Determinants in a Low-Fertility Era in Chin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Vol. 15, No. 2, 2019, pp. 127-130.

方面,欧美国家的“婴儿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减退,从60年代末开始又出现了新一轮低生育趋势,并一直延续至今,当前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多年处于极低水平(总和生育率低于1.3)。总体而言,当前低生育的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部分国家还处于高生育率、人口快速增长阶段之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已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

(二) 低生育的理论解释

通过世界人口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低生育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当时的低生育现象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虽然期间引发了一定担忧并且有些国家采取了鼓励生育措施,但战后“婴儿潮”的出现却使得人们认为低生育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而已,生育率至少会维持在维持社会正常继替的2.1的更替水平。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形象表达了这一“社会共识”,即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人口也将完成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化转变过程,最后的总和生育率将维持在更替水平或附近。^①

低生育的第二个阶段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并一直延续至今。其中,这个阶段前期(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是欧美国家结束了“婴儿潮”,低生育趋势再次出现并不断蔓延;后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则是一方面欧美国家低生育程度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低生育现象并且低生育程度不断趋近于欧美国家。

显然,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无法对第二阶段的低生育现象做出合理解释,比如生育率为什么会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低生育现象是暂时的还是长期持续性的甚至是永久性的,以及为什么许多经济社会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低生育现象。为了应对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不足,学术界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② 该理论以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低生育形势为基础,提出工业化、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经济社会系统日趋复杂和分化,另一方面人们婚姻和生育观念呈现个体化和多元化等现代甚至后现代特征。具体来说,婚姻和生育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不断提高,传统家庭性别观念(男尊女卑)和性别角色分工(男主外、女主内)不断弱化,包括同居在内的婚姻和生育观念以及婚姻形态呈现出个体化和多样化态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与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相比,“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更多是从人们思想观念层次来解释低生育现象。不过,“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虽然对于低生育现象给出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但总体来说该理论仍然过于宏大。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论证逻辑来看,该理论仍然主要是从经济、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宏观结构层面试图对于低生育现象成因和发展趋势做出一定解释,并且明显缺乏对于作为生育主体的育龄夫妇、生育决策过程以及决策影响因素的关注。

二、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脉络

在低生育现象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也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了快速人口转变过程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终实现了低生育水平。“随着非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组织的生育意愿调查逐渐增多”,

① K. Davis, 1945, The Worl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 Social Science*, Vol. 237, No. 1, 1945, pp. 1 - 11.

② V. D. Kaa, 1987,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Bulletin*, Vol. 42, No. 1, 1987, pp. 1 - 59.

生育意愿研究开始大量涌现,2010年以来更是成为中国人口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①本部分内容将首先介绍中国的人口转变和低生育历程,接着将系统梳理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生育意愿研究的学术脉络,最后将集中探讨三孩政策下生育意愿研究的拓展方向。

(一) 中国的人口转变和低生育进程

与世界其他低生育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转变与低生育进程不仅具有诸多共性,而且还具有鲜明的人口政策介入特征。总体而言,1949年以来的人口转变主要包括较高生育率时期和低生育时期这两个阶段。

较高生育率时期从1949年开始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结束,又进一步区分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生育时期、70年代生育率“急剧下降”时期以及80年代生育率“起伏徘徊”时期。^②其中,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高生育时期的典型特征是死亡率已经出现大幅下降但生育率仍居高不下,这一时期的特征与战后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一样,都是经济复苏、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改善的结果。

鉴于人口快速增长的现状,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施“晚稀少”的人口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和少生。也正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人口政策介入和避孕知识、技术和药物逐渐普及的情况下,中国生育率开始出现了快速下降,至70年代末已经降至仅略高于更替水平。为了进一步降低人口增速,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政策介入强度,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不过,整个80年代的生育率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而是呈现波动徘徊状态。当时主流观点认为,实现低生育率很可能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低生育却出乎意料地实现了。1992年“38万人生育率调查”显示,中国当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57,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不过,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一结果表示困惑和不解,认为主要是出生漏报和瞒报的结果,中国真实生育率至少在更替水平附近。虽然释放了中国已经实现低生育水平最初信号的1992年调查基本被否定,但随后的历次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都是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这也使得最迟至90年代末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低生育的人口现实。不过,当时主流观点仍旧认为中国已经实现的低生育并不稳定,其主要是人口政策制约的结果,如果没有人口政策,那么生育率会出现大幅反弹。

虽然2000年和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先后得到了1.22和1.18的较低生育率,但主流声音认为较低生育率是出生漏报和瞒报导致数据失真的结果,其真实生育率至少在1.8左右,同时依旧认为低生育是人口政策限制下的结果,存在大幅反弹的可能。不过,随着2014年“单独二胎”和2016年“全面两孩”的先后实施,生育率不仅没有出现大幅反弹,而且依旧较为低迷,以往的主流判断在人口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尤其是被公认为普查质量较高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得到的202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这为以往有关低生育是否真实、真实生育率是否仅是略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政策调整是否会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等争论画上了句号。^③也正是基于2020年人口普查所反映的较为严峻的低生育形势,中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

(二) 低生育水平下生育意愿研究的学术脉络

当前生育水平为什么会如此之低?要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关注焦点就需要从宏观层次的总和生育率指标回到微观层次的育龄女性或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主要指意愿生育子女数量,下同)。按照吴帆的梳理,国际上生育意愿研究“两度成为生育和人口政策研究的热点”。^④其中,第一次是在较

① 王军、刘军强:《在分歧中寻找共识——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政策研究与演进》,《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

② 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率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6期。

③ 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增加了身份证信息,并使用了与户籍、通讯等大数据的实时比对技术。同时,由于普查时“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已经接近5年时间,因此民众出生漏报和瞒报的动机大幅减弱。基于以上因素,社会各界普遍认为,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质量较高。

④ 吴帆:《生育意愿研究:理论与实证》,《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4期。

高生育率背景下,研究人们实际生育行为为什么高于生育意愿以及如何降低较高生育率,而第二次则是在低生育率背景下,研究为什么实际生育行为会低于生育意愿以及如何提高过低的实际生育水平。

国内生育意愿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相关研究,当时主要目的是为人口政策服务,即摸清政策规定的子女数量与群众实际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当时测量生育意愿的主要指标为理想子女数,即被访者所认为的一个家庭的理想子女规模,测量结果表明当时民众的生育意愿要明显高于政策规定的子女数量。

随着中国于1992年前后实现了低生育水平,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和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等全国性大型调查得到的生育意愿(平均理想子女数)也开始明显低于更替水平。当时主流观点认为,民众的实际生育意愿仍然较高,之所以得到低于更替水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主要是受到人口政策影响而导致的结果扭曲,“了解到的生育意愿实际上是基于当地生育政策的有条件的生育意愿”。^①学术界对于生育意愿的这种认识,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生育意愿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2010年以来,随着人口政策的进一步优化提上议事日程,生育意愿成为人口政策调整后中国出生人口形势估计的重要参数,生育意愿研究“肩负起越来越重要的决策使命,在预测政策调整效应中至关重要”。^②尤其是随着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民众的生育子女空间已经扩展为两个,政策生育率已经接近更替水平,因而人口政策对生育意愿的扭曲效应已经微乎其微,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基本反映了民众的自身生育意愿。这一时期生育意愿研究呈现一定程度的“井喷”状态,无论研究的广度、深度还是质量都有了较大提升,并对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和优化的实际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③

综观国内生育意愿研究的学术脉络,通过生育意愿来预测未来(近期和远期)生育水平的研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实行以独生子女为主的人口政策时期,生育意愿更多是作为人口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指标,当时认为民众的生育意愿要明显高于政策规定生育子女数。实现低生育水平以来,由于调查得到的生育意愿也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主流观点认为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受到了人口政策的扭曲,生育意愿研究也因此曾经一度沉寂。近年来,在人口政策调整过程中,生育意愿更多被用来作为人口政策调整效果预测研究的基本参数,生育意愿研究也重新焕发活力。

(三)三孩政策下生育意愿研究的拓展方向

在当前极低生育水平和人口政策不断宽松的背景下,国内低生育研究的焦点面临根本转向,并且存在两条分析路径。其中,第一条路径是从总和生育率的角度对导致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比如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就业、人口流动、“生育子女的费用和子女的抚养教育费用急剧增大”等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降低效应。^④第二条路径是通过对于低生育意愿的成因和形塑机制的分析来解释低生育现象以及实施相应公共政策。在当前人口政策较为宽松的情况下,生育意愿基本上反映了育

① 乔晓春:《关于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思考》,《人口研究》1999年第3期;郑真真:《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5期。

② 郑真真:《生育意愿的测量与应用》,《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6期。

③ 郑真真:《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兼以江苏调查为例》,《学海》2011年第2期;王军、王广州:《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估计》,《中国人口科学》2013年第4期;庄亚儿、姜玉、王志理、李成福、齐嘉楠、王晖、刘鸿雁、李伯华、覃民:《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基于2013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人口研究》2014年第3期;王军、王广州:《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人口学刊》2016年第2期;庄亚儿、姜玉、李伯华:《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人口研究》2021年第1期。

④ 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学海》2010年第1期;王广州、王军:《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与新变化研究》,《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1期;王广州、周玉娇:《中国家庭规模的变动趋势、影响因素及社会内涵》,《青年探索》2021年第4期。

龄夫妇真实的生育诉求。因此,学术界需要对于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测量方法以及低生育意愿的成因和形塑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应更多体现生育意愿的微观视角。

首先,需要发展出更为可靠和有效的生育意愿测量指标。目前国内外生育意愿测量的主流做法是使用理想子女数,但原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使用理想子女数测量生育意愿的效度较差。比如,风笑天认为,当前国内外大多生育意愿的测量均采用理想子女数,但这一指标实际测量的只是“人们对生育的看法”,而不是被访者对于自己生育的具体想法和意愿。^①郑真真也持类似看法,认为理想子女数测量的只是被访者所认为的周围“群体生育观念”。^②也正是由于理想子女数只是反映了宏观层面的社会生育规范,使得其对于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的个体缺乏足够变异性,这也导致了近年来国内生育意愿研究缺乏突破性进展。

其次,需要打开生育意愿自身的“黑盒子”,着力研究当前三孩政策下民众低生育意愿的成因和形塑机制。在限制性人口政策不断式微的情况下,宏观层面经济、社会、人口和文化的结构性特征、微观层面育龄夫妇自身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特征已经成为低生育意愿的主导性形塑力量。宏观和微观层面各个因素是如何导致了育龄夫妇的低生育意愿,成为生育意愿研究亟待破解的关键问题。当前虽然已有少量研究涉及这一方面,但总体还比较薄弱,大多讨论个体社会经济特征与其生育意愿之间存在的关系,至于该社会经济特征是否是低生育意愿成因以及各影响因素对于生育意愿的具体作用路径,无论在逻辑、理论还是实证上都欠缺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撑。

最后,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充分体现生育意愿视角。只有在有效测量生育意愿并且对低生育意愿成因和形塑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旨在提升生育水平的公共政策才能更具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从原先的限制性思维(通过人口政策限制过高生育意愿)转换为促进性思维(通过公共政策提升过低生育意愿),从而实现政策范式的转变。

三、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低生育意愿的测量及形塑机制

在低生育全球化趋势和实施三孩政策的背景下,中国的低生育现象与其他低生育国家已经并无本质不同,育龄夫妇自身的生育意愿日益成为决定中国当前和未来生育水平的决定性力量。本部分内容将首先介绍对于生育意愿测量方法的改进,然后将重点介绍对于民众低生育意愿的成因和形塑机制的研究进展。

(一) 生育意愿测量方法的改进

要客观研判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首先要做的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民众的生育意愿。鉴于只使用理想子女数并不能有效测量生育意愿,有学者提出了替代性解决方案,使得生育意愿测量指标更为有效和更具包容性,并且在具体测量技术方面存在从单一测量向量表测量的转变倾向。

首先,生育意愿测量指标方面,以 Miler 为代表的学者将其扩展为包括生育动机(fertility motivations)、生育愿望(fertility desires)和生育计划(fertility intentions)的整合指标体系。^③在整合人口学、微观经济学、心理学和生物学等多学科基础上,Miller 提出了生育意愿 TDIB 模型,认为从生育

① 风笑天:《当代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我们实际上知道多少?》,《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② 郑真真:《生育意愿的测量与应用》。

③ W. B. Miller, Childbearing Motivations, Desires, and Intention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Genetic Social &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Vol. 120, No. 2, 1994, pp. 223 - 258.

意愿到生育行为遵循“生育动机——生育愿望——生育计划——中介行为——生育结果”的发生序列。^①其中,生育动机处于潜意识层面,包括积极生育动机和消极生育动机两部分;而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则属于意识层面,生育愿望是人们内心渴望的子女数量,其与家庭和个人经济条件、夫妇健康、工作等现实状况关联度不高,而生育计划则是个人和家庭权衡生育愿望、现实经济条件、个人工作和健康状况之后做出的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现实关联度。

郑真真在借鉴 Miller 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生育意愿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包括“理想子女数、期望生育子女数、生育意向和生育计划”等多个指标,并将生育意愿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测量指标体系应用到“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等实地调查中。^②其中,理想子女数主要用于反映群体生育观念,期望生育子女数用“您自己希望生几个孩子”进行测量,生育计划则纳入了时间维度,用于测量被访者的实际生育打算。此外,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 2019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等近年来许多大型全国性调查对于生育意愿的测量都采用了至少包括理想子女数和期望生育子女数(或者生育计划)的双重指标体系。

其次,生育意愿测量方法存在从单一测量转向量表测量的趋势。比如,Miller 对生育动机的测量采用生育动机量表进行测量,并分为“积极生育动机”和“消极生育动机”两部分。^③在 Miller(1994)早期研究中,对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的测量则相对较为单薄,主要用“想要的子女数”和“计划生育的子女数”进行测量。^④为了应对这一不足,Miller(2011)改进了生育愿望的测量方法,仿照生育动机测量方法,对生育愿望(包括“愿望子女数量”和“愿望强度”两个维度)也采用了量表进行测量。^⑤

(二) 低生育意愿成因和形塑机制研究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这是因为主流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基本创立于高生育率时期,当时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释高生育现象以及如何尽快将高生育率降下来。虽然欧美一些国家最早于 19 世纪末就出现了低生育率,并持续至二战结束,第二次低生育浪潮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出现并一直蔓延和延续至今,但截至 20 世纪末有关低生育的理论却依然乏善可陈。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已经不能有效解释低生育现象,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虽然弥补了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一些不足,但仍然属于宏大叙事,缺乏对微观层面育龄夫妇自身生育意愿的关注。

21 世纪初以来,国际人口学界对于低生育的研究视角发生了一定的微观转向。鉴于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过于宏大,学术界致力于从微观层面提出有关低生育现象的更具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低生育理论模型、“低生育陷阱假说”、生育意愿计划行为理论、生育意愿 TDIB 模型是这些理论的典型代表。

Morgan 系统介绍了由 Bongaarts 最早提出的有关低生育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简称“低生育理论模型”),这也是最早对低生育现象从微观层面加以解释的理论模型。^⑥该模型的因变量为总和生育率,核心自变量为期望子女数(intended family size),而调节变量分为促进性因素和抑制性因素两类。

① W. B. Miller, Childbearing Motivations, Desires, and Intention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Genetic Social &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Vol. 120, No. 2, 1994, pp. 223 - 258; W. B. Miller, Differences Between Fertility Desires and Inten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No. 9, 2011, pp. 75 - 98.

② 郑真真:《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兼以江苏调查为例》;郑真真:《生育意愿的测量与应用》。

③ W. B. Miller,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and Its Measurement,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Vol. 127, No. 4, 1995, pp. 473 - 487.

④ W. B. Miller, Childbearing Motivations, Desires, and Intention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Genetic Social &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Vol. 120, No. 2, 1994, pp. 223 - 258.

⑤ W. B. Miller, Differences Between Fertility Desires and Inten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No. 9, 2011, pp. 75 - 98.

⑥ S. P. Morgan, Is Low Fertility a Twenty-First-Century Demographic Crisis? *Demography*, Vol. 40, No. 4, 2003, pp. 589 - 603.

其中,促进性因素包括非意愿生育(未经计划的意外怀孕)、性别偏好、替代效应(比如,如果子女意外死亡,则需要再生一个孩子);抑制性因素则包括进度效应(婚育延迟)、生理性不育、竞争性因素(职业发展、个人休闲等与生育发生冲突)。

可以看出,生育意愿在低生育理论模型中的地位并不高。该模型整体是以总和生育率为主导性结果变量,生育意愿则被看作是一个固定值,其测量指标也基本是以理想子女数或理想状态下期望子女数为主,而缺乏对生育意愿的可变性以及生育意愿具体成因的深入分析。

随后出现的“低生育率陷阱假说”(the low 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则主要致力于解释过低生育率(低于1.5)的长期持续和回升困难问题。^①“低生育陷阱假说”认为,低生育存在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即长期低生育将导致育龄女性的惯性减少(人口学机制)、低生育文化的代际传递(社会学机制)、子代消费观念和收入水平的不匹配(经济学机制),以上因素综合作用使得生育率一旦降至1.5以下则长期持续并且很难出现回升。

与低生育理论模型相比,“低生育陷阱假说”虽然同样将生育意愿(personal ideal family size)作为过低生育率的源头性因素,但认为生育意愿本身是一个可变因素,其受到低生育文化的代际传递这一社会学机制的影响,即少子化环境(比如较少的兄弟姐妹数、较少的同龄人)会使得处于其中的个人生育意愿相比多子化环境要更低一些。^②不过,“低生育陷阱假说”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虽然相比低生育理论模型其更为关注生育意愿的可变性,但仍然没有对生育意愿的具体形塑机制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与低生育理论模型和“低生育陷阱假说”不同,生育意愿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则对生育意愿的具体形塑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对于生育子女的态度(attitude)、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和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是育龄夫妇做出是否生育子女决定的直接影响因素。^③个人特征(人格、情感、智力、价值观等)、人口学特征(教育、年龄、性别、收入等)和社会层面特征(社会规范、文化、经济等)则通过对于生育子女的潜在后果、预期得到的社会支持、实现生育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三方面信念的作用来间接影响有关生育子女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控制感。

可以看出,生育意愿计划行为理论主要基于微观层面育龄夫妇生育决策的视角对低生育意愿的形塑机制进行了整合性分析,并且将宏观层面因素(比如社会规范、文化和经济结构等)也纳入了自身理论模型。当然,生育意愿计划行为理论也遭受了不少批评。首先,该理论对于生育行为的“理性假定”可能存在问题,未经计划的生育行为以及生育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并未涵盖在内;^④其次,该理论中的生育意愿仅指生育计划(打算),未能更为全面的测量生育意愿;第三,微观层次的个人和人口特征以及宏观层面的社会规范、文化和经济结构特征在该理论中只是作为背景因素,其对生育意愿的具体影响机制本身并不明确;最后,该理论还忽略了生物性因素(比如基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这对于生育这一明显具有生物和社会双重属性的社会行为来说显然存在较大问题。

Miller提出的生育意愿TDIB模型将“生育动机、生育愿望、生育计划”定义为生育意愿的连续发

① W. Lutz, V. Skirbekk, M. R. Testa, The Low 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No. 4, 2006, pp. 167 - 192.

② W. Lutz, V. Skirbekk, M. R. Testa, The Low 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No. 4, 2006, pp. 167 - 192.

③ I. Ajzen, J. Klobas, Fertility Intentions: An Approac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Demographic Research*, No. 29, 2013, pp. 203 - 232.

④ C. A. Bachrach, S. P. Morgan, A Cognitive—Social Model of Fertility Inten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9, No. 3, 2013, pp. 459 - 485.

生序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育意愿计划行为理论存在的一些不足。^① 并且,Miller 对生育动机的成因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生育动机由人格特质(personality traits)和成长经历(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共同形塑。^② 其中,无论是人格特质还是成长经历,都包括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以及成年期。具体形塑机制方面,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成年经历、成年人格特质都会直接影响生育动机,而成年人格特质则受到个体基因、儿童和青少年人格特质、成年经历的共同影响。也就是说,生育动机是先天因素(比如基因)和后天因素(比如成长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然,Miller 提出的模型也有其自身局限性。首先,TDIB 模型本身对于生育愿望、生育计划的定义和测量也存在诸多模糊不清之处,这也造成了实际操作中遇到较大困难;其次,该模型缺乏对于宏观结构、宏观结构与微观特征互动过程的关注;第三,该模型也没有对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做出像生育动机这样精彩深入的分析。

郑真真针对国内外现有生育意愿形塑机制理论的进展及局限,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实际,倡导一种“宏观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低生育意愿研究范式。^③ 该观点认为,生育意愿研究既要关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策等宏观因素,又要关注育龄个体的生育态度和偏好、生育养育能力和资源的自我评估等微观层面的直接影响因素,而低生育意愿则是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互动的结果。当然,如何在理论、逻辑和实证上能够真正做到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依然是有待完成的艰巨任务和挑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日益全球化,对于低生育意愿及其成因的研究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重点和新的理论增长点。虽然当前这一领域研究已经有所起步,并且跨学科特征明显,但总体而言仍处于研究前期阶段,一个真正具有整合性并且具有坚实经验基础的理论框架仍有待创建。

三孩政策的实施既为创建既遵循人口发展普遍规律,又能反映中国人口发展自身特点的生育意愿成因和形塑机制方面的理论提供了良好机遇。首先,三孩政策下生育意愿已经成为低生育水平的主导性驱动力,低生育水平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民众的低生育意愿;其次,三孩政策下民众低生育成因与其他低生育国家相比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其中,共性主要包括“高养育成本”、高房价、“不婚”或婚姻稳定性减弱、女性职业发展与生育的冲突、休闲娱乐等活动对于孩子的替代效应等。^④ 特殊性则包括生育政策、东亚家庭制度安排、性别角色、养育观念和“家庭教养方式”等。^⑤ 总之,如何创建更具包容性和整合性的低生育意愿成因和形塑机制的理论体系,是摆在当今中国学者面前的历史机遇和使命。

四、如何通过公共政策有效提升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视角

在低生育的全球化趋势面前,大多数低生育国家基本实行了旨在提升生育水平的公共政策。中

① W. B. Miller, Childbearing Motivations, Desires, and Intention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Genetic Social &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Vol. 120, No. 2, 1994, pp. 223 - 258; W. B. Miller, Differences Between Fertility Desires and Inten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No. 9, 2011, pp. 75 - 98.

② W. B. Miller, Personality Traits and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as Antecedents of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Demography*, Vol. 29, No. 2, 1992, pp. 265 - 285.

③ 郑真真:《低生育率下的生育行为及影响因素》,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编:《中国人口年鉴2016》。

④ 郑真真:《低生育率下的生育行为及影响因素》,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编:《中国人口年鉴2016》;吴帆:《生育意愿研究:理论与实证》;王磊、陈银虎:《中国终身不婚率的变动、影响与对策》,《青年探索》2021年第1期。

⑤ 郑真真:《低生育率下的生育行为及影响因素》,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编:《中国人口年鉴2016》;蔡玲:《育儿差距:家庭教养方式的实践与分化》,《青年探索》2021年第3期。

国近年来也大幅放松了生育限制,三孩政策下的公共政策取向清楚表明政府希望提升过低生育水平的决心。本部分内容将首先介绍与高生育时期截然不同的低生育水平时期的公共政策范式,然后将重点论述如何基于生育意愿视角,使得旨在提升生育水平的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更具精准性和有效性。

(一) 低生育水平下的公共政策范式

如前所述,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世界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目前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已实现低生育甚至处于1.3以下的极低生育率,许多国家的低生育持续时间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更是经历了人口形势的大逆转,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还在为高生育率和“人口爆炸”而忧心忡忡,到了今天则又开始为过低生育率和“人口塌陷”而忧虑不已。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低生育时期与生育相关的政策范式面临根本转向。在高生育率时期,公共政策的关注核心是如何通过家庭计划生育和相关配套政策以达到尽快降低过高生育率和过快人口增速的目标,以避免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贫穷、饥饿以及入学、就业和住房等方面的困难。而在低生育时期,公共政策的关注核心正好发生了180度转弯,从担心人口增长过快转变为忧虑人口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缺乏活力、劳动力不足、养老金和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可持续等问题。

与欧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对于低生育的适应和应对都面临更大挑战,这是因为从高生育到低生育的突然转变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要更为复杂。首先,与欧美国家一样,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逐渐感受到长期低生育引起的人口负增长、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劳动力规模锐减和年龄结构老化、国家医疗和社会保障负担过重、整体经济发展缺乏活力、消费市场疲软等问题的困扰;其次,与欧美国家不同,面临低生育困境的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国民素质、社会福利等还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其对低生育导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应对能力明显不足;第三,许多发展中国家之前长期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或家庭计划措施,其对人口总体呈现一定的负面态度,认为“人口规模的适度削减本身可能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以及资源和环境保护”,甚至“追求大幅削减人口规模”,这些长期形成的固化观念导致其对于低生育的应对措施往往明显滞后。^①

(二) 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的生育意愿视角

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低生育从首次出现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但人们对于低生育现象的认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大量空白和盲区,这也导致了对于低生育现象公共政策应对的明显滞后和政策实施效果乏善可陈。目前来看,只有北欧地区的“斯堪的纳维亚式”家庭政策起到了一定效果,使得北欧诸国生育率回升到1.8左右。而世界低生育率的两大洼地南欧和东亚地区许多国家虽然实行了生育友好甚至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但政策效果普遍不佳。比如,韩国为了应对低生育问题,于1996年取消生育限制并从2004年开始实行鼓励生育政策,但其近年来生育率却继续一路走低,2018年总和生育率首次跌破1,2020年又进一步下降到0.84,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近年来,学术界对公共政策介入低生育效果不佳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比如,Miller研究指出,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该更多基于育龄夫妇自身生育意愿的视角,这样政策实施才能更具实质效果,即更好地提升生育水平,并认为“缩小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的差距”应该成为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的主要着力点。^② 简而言之,生育愿望是人们“想不想生和想生几个”的问题,而生育计划则是人们“敢不敢生和敢生几个”的问题,因此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之间的

① 郭志刚、王军:《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的分歧与演进》,《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王军、周思瑶:《中国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与未来人口政策选择》,《青年探索》2021年第1期;王军、李向梅:《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人口政策困境与出路》。

② W. B. Miller, Differences Between Fertility Desires and Inten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No. 9, 2011, pp. 75-98.

差距就是人们“想生但不敢生”的问题。而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介入的主要目的就是缓解“想生但不敢生”的问题,因为“想不想生和想生几个”与遗传特质、成长和生育经历、价值观念等有关,要想改变难度较大并且时间较长,而“想生但不敢生”则主要是由于育龄夫妇考虑生育时面临的经济压力、时间成本、与职业发展的冲突等现实问题所导致,因此更适合公共政策介入并且也会更具政策效果。

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中国也加大了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财政投入和实施力度,包括大力发展托幼机构、促进家庭内部和职场的性别平等、缓解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冲突等。不过,本研究认为,三孩政策下的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还应在生育意愿有效测量和借鉴低生育意愿成因和形塑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更多体现出个人全生命周期、社会全人群、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三个视角,从而使得政策更具精准性和有效性。

首先,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不应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着眼于个人全生命周期,需要特别关注其成长经历和生育经历。^① 生育意愿成因和形塑机制的大量研究表明,育龄夫妇生育意愿(比如生育动机和生育愿望)受到本人青少年时期家庭和学校教育以及成年初期就业和婚姻等成长经历的深刻影响,同时育龄夫妇自身生育经历和生育体验也会导致自身生育意愿的明显改变。因此,公共政策要想达到有效提升过低生育水平的目的,就应将政策视野拓展为关注生育主体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努力在其童年、青少年和成年早期培养更多对于生育的积极态度,同时要特别关注育龄夫妇生育子女过程,尽力营造积极的生育体验,通过公共政策介入使得以往生育经历和体验能够成为再次生育的积极推动力。

其次,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还应将关注人群从育龄夫妇拓展为社会全人群,尤其是育龄夫妇的兄弟姐妹和长辈、社区(村落)近邻以及职场同事。按照相关研究,生育决策过程不仅是育龄夫妇两人之间的事情,而是育龄夫妇和“显著他人”互动的结果。其中,“显著他人”既包括育龄夫妇的兄弟姐妹、父母、所在家族的族长等亲属,又包括居住社区(村落)成员有关生育的规范、态度和实际行为。同时,现代社会的职场同事也是“显著他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同事的生育态度和行为会施加影响,而且与同事日常互动的质量和体验也成为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

第三,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在注重生育意愿微观视角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宏观视角的作用,并且要注重宏观与微观的良性互动。缺乏对于影响生育决策的宏观结构尤其是宏观结构与微观特征互动机制的关注,是当前低生育意愿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特别强调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宏观结构的关注,注重培育“儿童友好”“婚姻友好”“家庭友好”“女性友好”和“生育友好”的社会生态,并且引导宏观结构与育龄夫妇生育观念、态度和行为实现良好互动。此外,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还应体现足够的包容性。随着“国家治理效能”的不断提升和现代社会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实施旨在提高生育水平的公共政策需要以尊重育龄夫妇尤其是育龄女性本人的生育意愿为前提。^② 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存在“想生但不敢生”问题的育龄人群,通过现金补助、加强托幼机构建设、缓解女性生育与职业冲突等“缓解性政策”来减少这部分人群生育愿望与生育计划二者之间的差距。^③ 同时,还要充分尊重部分女性群体“一个也不想生”“生一个就够了”“最多生两个”等差异化的个人意愿。

① 陆杰华、伍绪青:《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主要特点、多重影响及其应对策略》,《青年探索》2021年第4期;翟绍果:《全生命周期下生育制度协同改革的政策意蕴、全球图景与中国画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② 齐卫平、陈冬冬:《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政党推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③ 王军、张露:《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形势、长期发展战略与治理策略》;黎淑秀:《长三角城市群的育儿困境及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青年探索》2021年第3期。

五、主要结论

三孩政策的实施,既是国家对当前极低生育水平人口政策方面的回应,也是政府和学术界全面认识中国低生育形势与发展趋势的良好契机。随着民众政策生育空间的不断扩展,生育意愿已经成为形塑中国当前和未来生育水平和人口形势的决定性力量。在人口政策不断宽松以及人口日益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背景下,研究当前民众的低生育意愿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政策价值。

要更好地研究中国当前低生育水平和民众的低生育意愿,离不开低生育的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自马尔萨斯首次发表《人口原理》以来的两百多年间,世界人口形势发生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变化。一方面,欧美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第二次低生育浪潮,低生育的严峻程度和持续时间都远超第一次。另一方面,低生育正在实现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或正在迈入低生育国家行列。不过,与低生育的全球蔓延相比,人们对低生育的认识却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存在许多空白和盲区,高生育时期发展出的旧有理论已经无法对全球低生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合理解释。低生育研究面临微观转向,即研究微观层面育龄夫妇自身生育意愿。

在低生育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同样实现了低生育水平并已持续近30年,当前的极低生育率形势呼唤生育意愿研究的彻底转向。由于人口政策的存在,中国的低生育历程与其他低生育国家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而生育意愿研究的基本取向一直是为人口政策服务的,前期主要用于了解民众生育意愿与政策规定之间的差距,近年来随着人口政策的不断调整,生育意愿主要作为基本参数用于预测政策调整对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可能影响。不过,在当前三孩政策下,育龄夫妇自身的生育意愿已经成为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性力量,这客观上要求生育意愿研究导向发生根本改变,要更为关注对于生育意愿更为有效的测量方法、低生育意愿的成因和形塑力量以及基于生育意愿视角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

在当前低生育形势下,无论是生育意愿测量方法还是民众低生育意愿成因和形塑机制研究都存在很大拓展空间。生育意愿测量方法方面,鉴于理想子女数对于生育意愿的测量效度较差,生育意愿可以拓展为包括生育动机、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的序列性指标体系。同时,对于生育意愿的测量也存在从单一指标测量向量表式测量的转换趋势;民众低生育意愿的形塑机制研究目前也已有明显进展,学术界先后提出了“低生育陷阱假说”、生育意愿计划行为理论和生育意愿TDIB模型这三种理论解释,尤其是计划行为理论和TDIB模型具有较大推广潜力。

有效测量生育意愿和清晰了解低生育意愿成因和形塑机制,也是三孩政策下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的基础。首先,低生育水平下的公共政策范式面临根本转向,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彻底摆脱以往高生育时期人口政策导致的思维定势,在对低生育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基础上要尽早通过实施有效公共政策以提升过低生育水平,从而尽量缓解低生育对经济、社会和家庭诸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其次,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应该基于生育意愿视角,政策重点应致力于减少育龄夫妇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之间的差距,即解决或缓解“想生但不敢生”的问题。同时,生育支持类政策还要充分借鉴低生育意愿成因和形塑机制研究的最新成果,将个人全生命周期、社会全人群、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这三个视角有机融入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整个过程。

(责任编辑:匡云)

(上接第 216 页)

Dual Empowerment: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ittee—Analyse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X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Service Center

Cui Yueqin, Zhang Yiwen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 governance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focu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ittee, as the link and bridge connecting the government and residents, shoulder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mission.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practice of X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Service Center, derived from X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ittee, presents the path exploration of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ittee, reflecting the dual empowerment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social professional forces. The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ittees should be based on building re-organiza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of community residents, connecting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field, rationally using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and social forces, and being core hub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he Impact of Online Games on Teenager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Su Jun, Sun Hao

Since the 21st century, China's online gam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growth point of network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lag of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many other reasons, online games are no different from flood and beast, which makes many teenagers lose their ambitions.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from 2014 to 2015,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tatus of China'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laying game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i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playing games is very common among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akes up most of their spare time. The intensity of playing game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same group effect plays a great role in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and the same group drop-ou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introduction of reasonable regulatory policies to reduce students' playing time is an urgent measure to run a satisfactor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Low Fertility Willingness Research Under China's Three-Child Policy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Wang Jun, Wang Guangzhou

Low fertility is currently spreading globally which cannot be fully explained by classical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The current lowest-low fertility in China requires the research focus shift to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measurement, causes and the public policies relating to low fertility willingness. Firstly, the fertility willingness can be expanded to a sequential indicator system including fertility motivations, fertility desires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Secondly, the low 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the TDIB model are thre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for the shaping mechanism of low fertility willingness. Finally, public polic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ow fertility willingness should strive to reduce the gap between fertility desires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